

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

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for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Taking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s an Example

徐 源

Xu Yuan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北京, 100165)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ijing, 100165)

内容提要: 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作为革命纪念馆工作的重要内容, 是激发革命文物活力, 满足人民群众对革命文化精神需求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近年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实践, 总结当前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的主要途径及难点, 归纳出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途径主要有捐赠、购买和借展, 应丰富文物捐赠方式、完善文物征购体系、加强馆际交流, 让革命纪念馆的文物征集工作活起来。

关键词: 革命纪念馆 革命文物 文物征集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ork of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revolutionary cultural spirit.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the War of Chinese People'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ways and difficulties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and concludes that the main ways of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include donations, purchases and loan exhibitions,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nrich the methods of cultural relics donation, improve the cultural relics procure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inter-museum exchanges, to bring back to life the cultural relics colle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Key Words: The revolutionary memorial museum; revolutionary artifacts; collection of cultural relics

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是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和文物资料的保护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它作为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通过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2]，同时更重人文、重传统、重精神和思想教育^[3]，并主要通过征集、保护、宣传等途径来履行职能。

新时代下，革命纪念馆的思想教育作用凸显，是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任务的重要阵地。文物是博物馆开展业务工作的基础，文物征集与研究利用促进博物馆文化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全面持续地发挥革命纪念馆的作用，必须不断完善文物征集方式，提高文物研究利用水平，进一步激发文物活力，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馆”）作为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历史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主题，围绕抗日战争进行针对性的文物征集，对丰富展览内容、提升展览效果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革命文物内涵

革命文物的内涵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中提出“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示纪念”^[4]，战士遗物是革命文物的雏形。1949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征集革命文物令》正式提出“革命文物”一词，并明确了“以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远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及同时期”的时间范围，并举例说明了“一切有关革命之文献与实物”^[5]，即革命文物。196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通过文物专门法规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

度，并指出革命文物包括“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重要人物有关的，具有纪念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资料”^[6]。革命文物的内涵更加细化，并将不可移动文物纳入其中。改革开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于1982年正式颁布，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关于革命文物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革命文物“具有教育意义”的用法。在随后十余年中，革命文物概念逐渐淡化，在《文物保护法》（2002修订）中可以发现，革命文物相关概念基本被近现代文物取代。

新时代以来，革命文物得到高度重视。相关政策文件对革命文物内涵做出深刻阐释，并将其作为特殊门类文物与近现代文物并列。在2018年10月国家文物局印发的《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中可见：“革命文物主要是指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自由的英勇斗争，见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历史，并经认定登记的实物遗存。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彰显革命精神、继承革命文化的实物遗存，也纳入革命文物范畴。革命文物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可移动革命文物。”^[7]另外，在2020年《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又增加了重要内容：“与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关的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等均属于革命文物范畴。”^[8]至此，革命文物长期存在的下限模糊问题逐渐变得清晰，内涵特点得到了高度概括。

综上所述，革命文物指的是1840年以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精神，特别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阶段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不断向人民群众传播正能量，具有重要纪念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实物遗存。抗战馆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主题，围绕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历程、影响及意义进行文物征集，集中于与抗日战争相关、能够反映抗战史

实、可以提供研究和展陈使用的各类史料、文献和实物,尤其是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历史文献、史料和实物;既包括正面反映中华民族奋勇抗战的典型革命文物,也包括曾给中国人民造成深痛灾难的日军罪证类实物。因此,抗战馆所征集文物基本符合革命文物内涵特点,以此为载体,力求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与产生的伟大精神叙述好、展示好、宣传好。

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征集的基本途径

在准确把握革命文物内涵的基础上,革命纪念馆需要以革命文物为重点,打造形成一套有本馆特色的藏品体系。为实现该目标,革命纪念馆结合立馆主题、业务规模、展览陈列等因素,通过制定个性化的文物征集方案,使文物征集工作方向明确,措施有力,促进纪念馆各项业务工作健康发展。为科学、精准完成文物征集,抗战馆文物征集主要通过接受捐赠、购买和借展等方式来实现。

接受捐赠是抗战馆文物征集的主要方式,具有公益性、广泛性、波动性和见证性等特点。

第一,捐赠活动具有公益性。捐赠的公益性符合博物馆、纪念馆非营利性的初衷,广大文物捐赠者向国家无偿捐赠,将个人收藏、家族保管,升华为国家收藏、民族记忆,这种化私为公的高尚行为值得人们广泛称赞和社会宣传。第二,博物馆接受捐赠的数量具有波动性。近年来,抗战馆接受捐赠数量年均均在200件(套)左右,受社会环境影响波动性较大,例如2021年,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文物捐赠数量达到近年高峰,全年收到捐赠400余件(套),其他年份文物捐赠数量相对较少。第三,接受捐赠来源广泛,根据抗战馆文物征集接待情况,捐赠者主要有几类:一是抗战老兵及亲属

后代,他们保存有大量革命文物,是革命文物的直接关联者,这些文物非常珍贵,流传经历清晰,故事性强;二是专家学者,他们长期从事科研工作,保存了各种版本的书刊、报纸、文献档案等,流传经历较清晰、史料价值较高;三是海内外爱国人士、热心群众,他们热衷从社会上广泛搜集革命文物后捐赠给抗战馆,以民间生活物品、日军罪证等为主,相对前两个群体而言,其文物价值较低但总量较大。第四,接受捐赠区别于其他征集途径,具有重要的见证意义。就文物捐赠者而言,来到抗战馆这一卢沟桥事变爆发地,将珍藏多年的文物进行现场捐赠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是一次爱国主义洗礼。另外,就文物本身而言,通过接受捐赠的途径征集的文物很多是由抗战亲历者留存下来,具有重要的见证意义。例如,一级文物《萧克向中央军委的报告(手稿)》曾由萧克本人捐赠,捐赠时他说:“这些东西放在我自己手里意义不大,放在纪念馆不但有利于热心研究抗日战争历史同志们,更有利于教育青年一代不忘战争灾难,鞭策他们发奋图强,中华民族强盛了,才能不受外来侵略。”^①

目前,抗战馆馆藏珍贵文物基本都来源于社会捐赠,这也是建馆以来一直坚持的重点征集方式。这一征集方式不仅持续增加了馆藏文物数量,也是文物品质的保证。

文物购买是抗战馆补充馆藏藏品数量、完善藏品结构的重要途径,具有市场性、计划性、专项性等特点。

第一,文物购买同样具有市场性,文物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而变化。革命纪念馆普遍为国家非营利性机构,需要有专项预算资金支持,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文物购买。目前,抗战馆的文物购买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向文物商店等法人机构购买,它们能够快速收集民间流散的文物;二是向文物收藏家购买,一些红色收藏家收藏的文物数量十分惊人,部分文物品相、种类甚至超过国有收藏机

① 1990年,抗战馆工作人员专程拜访了萧克同志,在文物征集过程中记录下了他这段感言。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北平抗日斗争文物故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1页。

构。第二，抗战馆的文物购买严格按照北京市财政资金使用规定方能实施，必须有一定计划性。文物征集部门根据文物需求，预先到潜在目标市场搜寻线索，拟定预算计划方案，以项目形式提交，申请征购专款，最后纳入项目管理并实施。往年文物购买项目，购买数量均在百余件（套）以上，购买进度须在一年内完成。第三，文物购买需使用专项资金。不同于文物捐赠的日常持续积累，文物购买既要合理使用资金，又必须在短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完成任务指标。2022年，抗战馆为筹备相关展览，启动抗战文物征集专项，目标是征集购买一定数量规模、提升展陈效果的抗战时期文物。征集人员在购买过程中，有针对性地筛选能够展现中国共产党抗战历程的革命文物以及展出率高的文物，把经费花在刀刃上。最终，抗战文物征集专项购买到《毛泽东自传》《新民主主义论》^①等120余件（套）革命文物。

2021年5月20日，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文物博发〔2021〕21号），为各革命纪念馆进行文物征集购买，提供了法律依据和经费保障。

严格意义上讲，文物借展在性质上属于短期借用外馆文物，并非新征集文物入藏。但是，全国各地的革命纪念馆的藏品征集范围难免交叉，而所征集到的文物又往往受到地域、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可能造成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的同质化。在新时代“让文物活起来”背景下，借展成为当下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的一种重要途径和趋势，它具有自愿性、合作性、时限性等特点。

第一，借展方必须充分尊重出借方意愿，由出借方根据文物现存情况及管理规定等因素决定是否出借，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方能办理借展手续。第二，借展通常是举办某一展览而向外部寻求合作的行为，双方协商并签订借展协议。近年来，抗战馆举办的多项专题展览都获得了全国各兄

弟单位的借展支持，展览反响热烈。2021年，抗战馆联合全国60家单位举办“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借展文物140余件（套）。通过兄弟馆文物的加入，展览更加丰富鲜活。第三，借展时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状态和展览使用需要，双方商定明确的归还期限。因此，借展适用于一些临时性专题展览或短期内开展的重大题材展览活动。

以上三种途径是目前抗战馆文物征集所采用的主要形式，在与全国其他兄弟单位交流过程中发现情况基本类似。此外，文物调拨的方式，也可以为一些新建的革命纪念馆快速积累文物，但这一途径政策性较强，一般适用于一些大型的、肩负重大政治任务的革命纪念馆。以原中国革命博物馆为例，仅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的第一年（1950年），就收到政务院拨交的文物1373件^[9]。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量革命文物用于“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基本陈列。总之，这种方式较为特殊，本文恕不赘述。

三、抗战馆文物征集面临的困难与挑战

近年来，征集革命文物的难度逐年增加，征集形势更加严峻。与全国的革命纪念馆一样，抗战馆的文物征集也受到一定困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接受捐赠难度加大

统计近年来抗战馆的文物征集情况，笔者发现接受捐赠的革命文物数量略有减少，且直接反映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革命文物比例有所下降。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革命文物捐赠者越来越少。许多历史事件亲历者、见证者普遍年岁已高，在世的抗战老战士基本都在90岁以上，许多由于行动不便，对外联

① 《毛泽东自传》由毛泽东口述，〔美〕埃德加·斯诺记录，张洛甫翻译，1937年12月延安书局出版。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1940年5月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

系逐渐减少。部分家属后代缺乏革命文物意识,对家中留存下来的物品没有研究整理,捐赠意愿不强烈。其次,革命文物资源稀缺、不易保存。抗战文物形成于条件艰苦的战争时期,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革命文物,大部分观赏性较弱、不易保存。许多日常生活用品,除金属制品、木制品、棉纺织品等因耐久度较高可能保存外,其他实物丧失原有功能后逐渐被弃用,一些纸质文物甚至被当作旧书按斤论两当卖,导致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白白流失。最后,革命文物征集业内竞争激烈。2021年8月,《国务院关于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显示,革命类博物馆、纪念馆超过1600家,其中国家级抗战类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单位有近300余家。随着同行业同主题的革命纪念馆数量迅速增加,供社会捐赠者选择的捐赠对象增多,出现各馆竞争同一件文物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紧张。因此,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不仅面临着文物稀缺的压力,还面临着同行单位竞争的巨大压力,诸多因素增加了革命文物的征集难度。

2. 文物购买面临新挑战

《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对国有博物馆的文物购买提出了最新的指导意见,广大博物馆、纪念馆须在新规程要求下进行文物购买,各馆自主做好工作,应对购买过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笔者认为,新规后抗战馆的文物购买工作,挑战和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政策调整带来的挑战。为加强对文物购买的监督管理,新规规定文物购买纳入单位“三重一大”事项管理,并对文物购买过程中的文物鉴定、经费使用、决策审批等九个环节流程作了规范性说明。根据抗战馆实际情况,仅征集调查、文物鉴定和文物估价三个环节就需要花费数月时间和精力着手筹备,力求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备齐全,有效辅助专家审核与判定。总之,面对购买环节增多、周期相对缩短、大额资金使用风险等问题,单位和文物征集人员需要及时转变工作方法,按新规制定文物购买方案并牢牢把握时间进度。二是革命文物鉴定

压力增大。文物购买过程中,文物鉴定是核心环节,包括对真伪、价值、价格等要素评估,它直接关系到征集工作的成败。近年来,革命文物鉴定难度逐渐增大。从客观方面看,随着科技手段不断进步,文物作伪技术提高,文物伪品在市场流通屡见不鲜、屡禁不止。革命文物尤其造假难度低、成本低。文物伪品不仅给文物购买工作带来安全风险,还浪费了工作人员的时间和精力。从主观方面看,革命文物朴实无华、庞杂多样,其蕴含的深层次价值需要认真明辨,所处的市场价格水平需要充分调研。但是,面对数量庞大的革命文物,各馆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略显单薄。另外,革命文物鉴定专家数量较少、储备不足。即使在专家资源较为丰富的北京、上海等地,革命文物鉴定专家也普遍年龄偏大,有的门类专家寥寥无几。如今各馆项目较多,文物数量需求动辄成百上千的情况下,专家在短期内连续鉴定,压力倍增。

3. 文物借展仍存在诸多问题

新时代以来,各馆通过借展这种特殊征集方式可以实现互通有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文物征集支出^[10]。展览通过讲述各地鲜活的革命故事,更广泛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各地革命文物“活起来”。不难发现,借展可以给展览双方带来诸多正面影响,但依然存在问题,根据近年来抗战馆的借展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在革命类展览中,文物表达需要准确到位,当本馆缺少某重要人物或重要事件的相关文物时,短期内唯寄希望通过借展来达成目标。但由于对外馆文物信息陌生,尤其不了解新征集的文物,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向外问询来匹配展览。第二,程序上时间进度问题。借展文物的确定需根据展览大纲而定,但革命类展览涉及意识形态领域,要经过严格的层层审批,大纲部分内容修改后,文物随之变化,留给借展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如若借展文物数量较多且零散分布在偏远地区,借展压力将会迅速增大。另外,如果所借文物为珍贵文物,出借方须提前向文物主管部门报备申请,待审批后方能同意。第三,借展手续繁杂。各

出借方的诉求略有不同，主要集中体现在运输方案、图片使用、安全保护、借用期限等方面，借用方需根据各出借方的不同要求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面对不同单位处理不同问题。这些都对借展投入的人员力量和借展单位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新时代革命纪念馆如何做好文物征集工作

如前所述，革命纪念馆区别于其他历史类博物馆，文物征集主要通过接受捐赠、购买、借展等途径，这也是由革命文物特点所决定的。革命纪念馆在深刻认识革命文物内涵基础上，科学制定具有本馆特色的文物征集方案，客观应对当前文物征集存在的问题，既可以使文物征集更加高效，也可以使展览展示更加翔实。

1. 深挖革命文物资源，丰富捐赠方式，让文物捐赠“活起来”

接受捐赠是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途径。前文已述，来源于捐赠的革命文物往往流传有序，更具故事性和感染力，有较高的文物价值。针对接受捐赠革命文物难度变大的问题，文物征集工作需要争分夺秒，主动出击，提高征集工作主动性。笔者认为，抗战馆以下几点做法值得分享。

一是紧扣纪念日开展仪式活动，增强捐赠的仪式感。要努力维系好与老战士及亲属后代等群体间的深厚友谊，每逢清明节、七七事变纪念日、九三抗战胜利日等重要纪念日，抗战馆邀请老战士及亲属后代、重要文物捐赠人等老朋友来参加仪式活动，共同铭记重要历史时刻。

期间，要善于发挥媒体作用。馆内利用官方公众号、短视频等新媒体直播宣传，同时推介近期展览，展示革命文物；馆外邀请中央或地方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采访，向社会群众讲述老战士的革命故事。长此以往，他们利用自身资源为我馆提供了更多的文物线索，甚至直接帮我们做联络工作，最终推动更多文物捐赠。

二是广开征集通道，提高捐赠主动性。文物捐赠取决于捐赠者意愿，而捐赠者可能由于身处异地，路途不便降低了捐赠意愿。对此，抗战馆高度重视并通过实际行动争取异地文物捐赠。以李少言相关文物捐赠为例，2020年，当闻悉原八路军120师司令部秘书李少言夫人侯文川有意捐赠珍藏多年的木刻画，抗战馆文物征集人员立刻申请前往四川拜访老人，现场查看文物，为其介绍捐赠流程及捐赠后文物的保护利用。经过沟通与协商，侯文川同意将1940年《一二〇师在华北》34幅木刻组画原作及李少言亲手制作和使用的刻刀、刨子、凿子、锤子、装刻刀的木盒等40余件文物捐赠抗战馆。为见证该革命文物捐赠的重要时刻，抗战馆择日由馆长带队，再次赴四川专门为侯文川及家人举办了捐赠仪式，促成该组珍贵文物入藏抗战馆。该组版画后多次亮相专题展览，获得广泛好评。2021年，抗战馆征集人员再次赴四川看望慰问侯文川老人时，她捐赠了李少言的代表作《重建》版画原作，这也是她保存的最后一幅李少言创作的版画。抗战馆通过网络宣传李少言创作版画及侯文川捐赠珍贵版画背后的故事，后由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成系列纪录片，引起广大革命文物持有者的关注，纷纷向抗战馆咨询文物捐赠事宜。2022年，1940年《一二〇师在华北》34幅木刻组画原作、1942年《重建》版画原作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三是活化文物史料，启动老兵口述历史记录。2023年，为健全首都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充分利用北京丰富的革命文物资源优势，为抗日战争历史留下珍贵的影像资料，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在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和市委老干部局支持下，抗战馆启动了“抗战老兵口述史采访工作”项目。目前，对老战士采访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已开展16期。在采访过程中，工作人员获悉的一些文物线索及时共享给文物部门，取得了显著效果。目前，借助这一项目，已办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等多件革命文物捐赠事宜，相关口述资料也及时整理编入藏品档案，为日后的数字化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完善文物征购体系, 科学精准施策, 让文物购买“活起来”

随着文物购买新政策的出台, 广大革命纪念馆需要及时转变文物购买做法, 迎接新的文物购买任务和挑战, 让文物购买“活起来”。抗战馆作为最早一批践行新规完成文物购买的革命纪念馆, 面对文物购买中的困难问题, 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点。

第一, 完善文物征购相关规章制度。以《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程》为指导, 形成本馆的文物购买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自国家印发新规后, 抗战馆文物部门第一时间组织学习, 由征集人员草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物征购规程》, 再由部门集体讨论修改, 后报请馆党委审核批准。通过对规程的深入学习, 文物征集人员也基本掌握了征集调查、专家鉴定、估价建议、价格谈判或协商、征集实施、支付验收、登记入账、建档备案、监督检查九个环节的总流程, 规范了具体操作。

第二, 以项目模式引导文物购买, 确保文物购买的精准性。2022年, 抗战馆以项目模式实施的文物购买, 从项目申报到完成用时约1年, 在计划时间内完成文物购买120余件(套)。整个项目过程, 征集调查、专家鉴定、估价建议等基础环节耗时最多, 须控制在6个月以内完成。在搜集汇总文物清单之后, 进行现场查验, 并对比馆藏文物及市场形成拟征集文物清单。在专家鉴定环节, 专家独立评判每件文物的真伪、价值, 并进行文物估价, 真伪实行“一票否决”, 整个过程严格保密。然后, 由文物部门集体决策形成最终估价, 以此作为拟征集文物价格上限参考。项目模式的优点是文物征集针对性强、品种丰富、价格相对便宜, 而且环节清晰, 执行有关国家政策更加有力。一个项目带动一批文物的征集, 馆藏文物的品质、数量都得到较大的提高。

第三, 以项目制带动人才队伍建设。革命文物购买项目在短时间内工作量较大, 鉴定存在压力。为高效保质地完成革命文物鉴定工作, 势必要在初始阶段从大量文物中剔除一部分或进行重点标注, 为后续的专家鉴定减轻压力和负担。快节奏、压力

大的工作要求征集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实操经验。通过项目负责制, 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也培养了项目团队取长补短、团结合作的精神。

抗战馆近年来十分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 鼓励在项目锻炼与成长, 快速积累实践经验, 将博物馆学理论知识与征集实践结合起来。在筹备“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香山”“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中华一脉 同心筑梦——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主题展”等展览项目过程中, 文物征集人员经过多次的展览项目文物购买, 提高了自身水平, 积累了实践经验, 团队协作能力大幅提高, 队伍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相应提高。

3. 加强馆际交流, 依托高层次平台与专业技术, 让文物借展“活起来”

如前文所述, 借展是增进人们了解不同地域文物的重要手段, 也成为让各地革命纪念馆间文物“活起来”的重要桥梁。上文提到的借展信息不对称、时间紧、手续繁杂等问题, 唯有加强馆际交流, 增进互信互助方能有效解决。以抗战馆为例, 主要做法如下。

首先, 搭建信息共享的专业平台, 依托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平台, 与兄弟单位互通有无, 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困难。目前, 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共有会员单位237家, 成员间经常开展实地调研交流, 抗战馆作为主任委员单位与会员单位广泛开展合作办展, 以座谈、学术沙龙等形式分享学术信息, 以巡展、特展等形式共享资源成果。自2013年至今, 抗战馆创新多种巡展合作模式, 先后与55家单位展开合作, 举办国内巡展71个, 已走遍24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国内近40家博物馆、纪念馆提供展览内容素材, 共同策划举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已形成抗战主题展览国内巡展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品牌^[1]。2017年, 抗战馆联合了21家兄弟单位共同举办“伟大抗战 伟大精神——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主题展览”, 该展览展出文物281件(套), 其中借展文物83件

(套),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2021年, 抗战馆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之际, 联合了60家兄弟单位推出了“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展”, 精选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馆的精品文物520件(套), 其中借展京外地区文物近200件(套)。该展览全面详实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被中宣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推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

其次, 依托文物复制技术, 降低借展时间压力和安全风险。由于革命文物大部分为纸质文物, 复制难度相对较低。其中, 对一些非珍贵文物尽早协商复制, 可降低风险并减轻后期压力。抗战馆作为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单位, 纸质文物修复技术人员齐备, 可在短期内对纸质文物进行复制。通过与出借方协商, 以远程传输基础数据和高清图片为复制提供支持, 满足展览对文物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办法,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借展压力, 降低了文物安全风险, 也能达到较好的文物展示效果。

最后, 提前谋划, 形成规范可行的标准化借展模式。应对不同博物馆、纪念馆的借展要求, 为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文物部门可先行拟定好批量的借展函, 尽可能详细地分别附上文物细目。同时, 尽早启动替代性低的文物的借展事宜, 并预先制定好

《文物借展使用协议》《文物运输方案》《文物展出保护方案》等标准文件, 将文物借展工作做到规范可行。通过这些做法, 借展耗时将大大缩短, 也为部分基层革命纪念馆节省了精力, 减轻了不必要的负担, 有利于促进长期的交流互助。

新时代以来, 加强馆际协作与合作办展成为革命纪念馆发展的重要方向, 借展作为文物征集的一种特殊方式, 促进了地域间的革命文物流动。这些文物在展览中共同向全国人民展示出各地民众为革命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是让文物“活起来”的直观表现。

五、结语

通过多年的实践, 抗战馆积累了一整套比较成熟、比较系统的文物征集途径方式, 对国内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具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同时, 革命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必须紧跟新时代步伐, 在坚持和完善捐赠、购买及借展三项重点途径方式基础上, 不断探索和创新, 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制定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文物征集策略。我们相信, 当革命文物征集获得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更科学地推动和实施, 革命纪念馆的文物资源一定会真正活起来。

参考文献

- [1] 文化部. 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文物字〔85〕第16号) [Z]. 1985-1-9.
- [2] 被赋予新定义的博物馆——以人为中心 与城市相融 与时代偕行[N]. 中国文化报, 2022-9-2(3).
- [3] 安廷山. 中国纪念馆发展历史初探[J]. 中国博物馆, 1995(1): 33.
- [4] 跃森. 革命文物涵义[J]. 中国博物馆, 1988(1): 92-94.
- [5]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 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10): 8.
- [6] 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Z].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1961(4): 76.
- [7] 国家文物局. 关于报送革命文物名录的通知(文物政函〔2018〕1270号) [Z]. 2018-10-18.
- [8] 国家文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第二条[Z]. 2020-11-10.
- [9] 陈翔. 浅谈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中的创新意识[C] // 博物馆藏品保管学术论文集.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4: 149.
- [10] 唐强. 革命纪念馆藏品相关工作的几点思考[C] // 博物馆学文集(11).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6: 361.
- [11] 王业鑫, 罗存康. 革命类纪念馆原创新展巡展工作的实践与思考——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为例[J]. 博物院, 2022(4): 95.